

“靖节征士”：颜延之《陶征士诔》中的陶渊明谥号及相关问题*

罗布桑

摘 要：元嘉四年颜延之所作《靖节征士诔并序》是研究陶渊明同时代的核心文献，其中为陶渊明拟定的“靖节征士”谥号长期为学术界所忽略，其背后蕴含晋宋之际的谥法规范、文人价值取向与特殊历史背景。依托史料梳理与文本互证可知，“靖节”二字严格契合《逸周书·谥法解》的规范，精准对应陶渊明宽乐令终、好廉克己的人格特质，而“征士”入谥则存在体例生硬、叠床架屋的问题，《文选》改题亦印证此点。陶渊明有“晋征士”与“宋征士”两种称谓，源于东晋末至刘宋其三次拒绝征辟的经历；颜延之《靖节征士诔并序》与陶渊明诗文存在深度互文关联，其对陶氏躬耕形象的塑造是“从陶公之志”的结果；“靖节征士”谥号的深层成因，实为颜延之等友人刻意遮蔽陶渊明仕于桓玄的经历、保护其家族的历史选择。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隐士形象是晋宋之际知识界有意塑造的结果，其政治阅历与文学成就密不可分，唯有通观其全人，方能真正理解其田园诗的精神内涵与隐逸文化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颜延之；陶渊明；《陶征士诔》；靖节征士；谥号；晋宋之际

DOI: 10. 11714/jssysu. sse. 202604001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去世，随后颜延之作《靖节征士诔并序》(以下简称为“颜《诔》”)，题曰“宋金紫光禄大夫赠特进颜延年撰”^①。颜、陶二公交谊深厚，这是颜《诔》写作的人事关系背景。颜延之与陶渊明的交往，是门阀士族文人与寒门隐士交往的典型案列。颜延之出身于琅琊颜氏，陶渊明出身于浔阳陶氏，二人的交往打破了门第壁垒，折射出晋宋之际重才情、轻门第的文人风尚，也为研究当时的隐逸文化提供了鲜活样本。《文选》卷57颜延之《陶征士诔》李善注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②
沈约《宋书》卷93《陶潜传》：

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③

* 收稿日期：2026—01—30

作者简介：罗布桑，原名范子烨，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兰州 730030)；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2445)。

① 该文为宋刻递修本10卷《陶渊明集》附录文献之一，见《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21—227页。该本题曰“《靖节征士诔并序》”，“静”乃“靖”之讹，曾集本陶集与此相同，李公焕笺注本陶集、苏写本陶集将“静”更正为“靖”，但题曰云云漏“撰”字。此诔《文选》著录为“《陶征士诔》”，见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7，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90—793页。本文以《靖节征士诔并序》为正，参见下文。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7，第790页。又《隋书》卷33《经籍志》：“《晋中兴书》，七十八卷，起东晋。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撰。”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5页。

③ 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8页。

颜《诔》言“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颂辞记述陶渊明隐居生活“晨烟暮霭,春煦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诔文并非泛泛的应酬之作,而是基于真实交往的情感结晶,“极其思致”正是诔文情感浓度的最佳注脚。对于颜、陶二公而言,“饮酒”是他们交往的核心载体,这不仅符合魏晋南北朝文人以酒寄怀的风尚,更暗示出二人的精神共鸣——陶渊明以酒明志,颜延之以酒助兴,酣饮的过程实为精神对话的过程,由此把酒上升为一种“精神饮料”。而以今人的眼光看,颜《诔》具有当代人看当代人和当代人写当代人的属性,它无疑是关于陶渊明生平事迹与时人评价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本文拟结合晋宋时代的相关史料,重点揭示颜《诔》中长期被学术界所忽略的谥号问题,期能对陶渊明研究有所推进。

颜《诔》曰:

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①

这是颜延之为陶渊明拟定“靖节征士”谥号的核心论述,记述了“靖节征士”这一谥号产生的背景和缘由,兼具文体规范、价值评判和文化立场三重内涵,既是对陶渊明人格的定论,也体现出晋宋之际诔文的文体功能与文人的价值取向。这段话遵循诔文“述德—议谥—定论”的文体逻辑,层层递进完成对“靖节征士”谥号的论证,结构严谨。“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是整段的立论基础,颠覆了魏晋时期以门第论高下的社会风尚:“实以诔华”,“实”指陶渊明的真实德行,“华”指诔文的文辞藻饰,明确诔文的核心是“述实”而非“炫辞”;“名由谥高”,指出谥号的价值在于彰显德行,而非抬高虚名;“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直接提出德行本位的评判标准——只要符合德义准则,身份的贵贱高低便不值一提。这一观点既是对陶渊明“寒门隐士”身份的正名,也是颜延之作为士族文人的价值觉醒。“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是谥号拟定的关键依据,严格遵循《逸周书·谥法解》的谥典规范。“宽乐令终之美”:“宽乐”指胸怀宽和、乐安天命,“令终”指善终,对应《谥法》“宽乐令终曰靖”;“好廉克己之操”:“好廉”指崇尚廉洁,“克己”指约束私欲,对应《谥法》“好廉自克曰节”;“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明确陶渊明的德行完全契合谥典条文,且与他一生坚守的隐逸之志毫无违背,从制度层面为“靖节”谥号的合法性背书。“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以“询诸友好”的程序正义收尾,既符合诔文“合众议、定谥号”的惯例,也体现出对陶渊明生前友人的尊重,让谥号的拟定更具公信力。戴卫红指出:“隐逸的得谥途径分为两类:一类是门生亲故私谥,一类是请谥朝廷而赐予。”^②由此可知,“靖节征士”属于“门生亲故私谥”。“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对陶渊明进行双重身份锚定:政治身份——“晋征士”,强调陶渊明曾被东晋朝廷征召(即《宋书》所载“征著作佐郎,不就”),却坚守不仕之志,为“征士”的谥号前缀提供依据;生活身份——“南岳之幽居者”,以“南岳”(庐山,属南岳衡山余脉)点明其隐居之地,以“幽居”凸显其远离尘嚣的隐士特质,为下文“德义”评判铺垫身份底色。颜延之通过这段论述,将陶渊明的隐士人格提炼为三个层次,构成“靖节”谥号的精神内核:首先是生存姿态——宽乐令终的隐逸之美。“宽乐令终”指向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他虽“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却能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安贫乐道,最后善终于林下。这种“宽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主动选择的精神自足,是魏晋隐逸文化从“放达任诞”向“安贫乐道”转型的典型体现。其次是“好廉克己”:陶渊明的人格底线——他拒绝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后坚守清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颜延之特别强调这一“操”(操守),正是对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人格的精准概括,也暗合了儒家“克己复礼”的道德准则。最后是

①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57,第790—791页。下引此文,不再一一出注。

② 戴卫红:《魏晋南北朝谥法制度研究》第六章《魏晋南北朝隐逸谥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401页。

价值立场——贵贱无算的德义之辨。“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是对陶渊明价值的最高肯定。在门阀士族垄断话语权的晋宋之际，陶渊明出身没落士族，只做到县令，社会地位不高，但颜延之却以“德义”为标尺，将其置于“贵贱”之上，这既是对陶渊明的推崇，也是对门阀制度的隐性批判。陶渊明之前的朝隐之士，如阮籍、嵇康，多以“放达”避世，带有反抗世俗的愤激色彩；而颜延之提炼的“靖节”谥号，将陶渊明的隐逸定义为“宽乐令终”“好廉克己”的守道之行，使隐逸文化从“愤激避世”升华为“安贫守道”的精神追求，为后世隐逸群体树立了典范。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妨从历史文化的语境中进一步考察这一谥号是否适合陶渊明。

首先，关于“征士”一词的基本含义。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6“征君征士”条：

有学行之士，经诏书征召而不仕者，曰“征士”，尊称之则曰“征君”。《后汉书·黄宪传》：“天下号宪为征君。”《魏志·王肃传》：“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注经传，颇行于世。”又《管宁传》注引《傅子》曰：“胡征君怡怡无不爱也”，“年八十而不倦于书，吾于胡征君见之矣”。胡征君谓胡晦也。后魏高允作《征士颂》，凡四十二人，皆与允同征者。^①

据此可知，征士是指受到朝廷征聘但又不接受朝廷征聘的学行素有的士人。在严格的意义上，“征士”并不符合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参见下文关于陶渊明从政问题的讨论）；但在实际的历史中，“征士”指称的对象却有个别特例。《文选》卷58蔡邕《陈太丘碑文》：

先生讳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其为道也，用行舍藏，进退可度，不微诤以干时，不迁贰以临下。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将军，宰闻喜半岁，太丘一年。德务中庸，教敦不肃。政以礼成，化行有谥。会遭党事，禁锢二十年，乐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谄上，爱不渎下。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及文书赦宥，时年已七十，遂隐丘山，悬车告老，四门备礼，闲心静居。大将军何公，司徒袁公，前后招辟，使人晓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践常伯，超补三事，纁佩金紫，光国垂勋。先生曰：“绝望已久，饰巾待期而已。”……大将军吊祠，锡以嘉谥，曰：“征士陈君，禀岳渎之精，苞灵曜之纯。天下慙遗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时靡究。搢绅儒林，论德谋迹，谥曰文范先生。”^②

多次为官的陈寔，仍然可以享受“征士”之称，这与其晚年拒绝朝廷征聘之举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即使有多次为官的经历，只要有一次拒绝朝廷征召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贤德之士也可以称为“征士”，而仅仅被朝廷征召尚不足以称为“征士”。

陶渊明与陈寔属于同一类型的征士，如颜《诔》即称“初辞州府三命，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浔阳陶氏本属寒门。《世说新语·贤媛》第19条：“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③后来陶侃以武功成为国家的柱石，位登长沙郡公^④，而陶渊明则显示了陶氏家族从军旅武功向隐逸名流的过渡：一生五次为官，其中三次是在军中任职，这是他的军旅生涯；而江州祭酒和彭泽县令，则属于低等文官序列。因此，尽管陶公后来选择归隐田园，却与从未参政的隐逸名流有很大差别。《晋书》卷92《左思传》：

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⑤

①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01页。

②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801—802页。

③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4页。

④ 据《晋书》卷7《成帝纪》，咸和四年（329）载：“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将军陶侃为太尉，封长沙郡公。”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4页。

⑤ 房玄龄等：《晋书》，第2376页。

《梁书》卷26《范岫传》:

范岫字懋宾,济阳考城人也。高祖宣,晋征士。父羲,宋兖州别驾。^①

这里提到的皇甫谧和范宣都是晋朝的大贤,平生从未出仕,故有“征士”的美名。《晋书》卷51《皇甫谧传》:

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②

而咸宁二年(276)十二月,晋武帝征召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③,被出身贫寒的皇甫谧拒绝。《晋书》卷91《范宣传》:

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亲没,负土成坟,庐于墓侧。太尉郗鉴命为主簿,诏征太学博士、散骑郎,并不就……宣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年五十四卒。著礼易论难皆行于世。^④

可见二人均以学问和真理为平生志业,是真正意义上的征士。再看南阳宗氏的情况:

宗炳字少文,南阳涅阳人也……炳居丧过礼,为乡闾所称。刺史殷仲堪、桓玄并辟主簿,举秀才,不就。高祖诛刘毅,领荆州……辟炳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余年。”高祖善其对策。妙善琴书,精于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敬弘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慧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于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高祖开府辟召,下书曰:“吾忝大宠,思延贤彦,而《兔置》潜处,《考盘》未臻,侧席丘园,良增虚佇。南阳宗炳、雁门周续之,并植操幽栖,无闷巾褐,可下辟召,以礼屈之。”于是并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征通直郎;东宫建,征为太子中舍人,庶子,并不应……衡阳王义季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讌(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⑤

自宗炳至宗彧之^⑥、宗测^⑦,宗氏祖孙终生未仕,并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实际上,从东晋开始,隐逸名士已经呈现家族化的特征,而浔阳翟氏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陶渊明的第二任妻子即出自这一家族^⑧。由此可知,晋代之隐逸名流,受到朝廷的征召从未应命者并不罕见。

对颜《诔》“有晋征士”一句,唐张铉题注:“陶潜隐居,有诏礼征为著作郎,不就,故谓征士。”^⑨《宋书·陶潜传》:“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此事又见《南史》本传和颜《诔》(参见下文)。因此,陶渊明如同陈寔,其享受“征士”之称是可以的。颜《诔》称“若其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谥典,无愆前志。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所谓“谥典”是指《谥法》,李善注引《谥法》“宽乐令终曰靖,好廉自克曰节”,正与颜《诔》相合。可见“靖节”二字准确概括了陶渊明的道德情操,如果将陶渊明的谥号定为“靖节先生”,这是非常准确也非常自然的,但是,陶公生前的好友们将“征士”二字纳入,创造了“靖节征士”这

①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1页。

②④ 房玄龄等:《晋书》,第1409—1410,2360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3《武帝纪》,第67页。

⑤ 沈约:《宋书》卷93《宗炳传》,第2278—2279页。

⑥ 沈约:《宋书》卷93《宗彧之传》,第2291页。

⑦ 萧子显:《南齐书》卷54《宗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40—941页。

⑧ 《宋书·陶潜传》:“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秬,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秬。”沈约:《宋书》,第2287页;《南史》卷75《陶潜传》:“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9页。

⑨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57《陶征士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60页。

一谥号,则实在未免生硬和牵强,所谓叠床架屋,不伦不类。类似的情况如以“文范先生”作为陈寔的谥号是可以的,而以“文范征士”作为他的谥号则是不合适的。因此,陶渊明的谥号,与其叫“靖节征士”,不如叫“靖节先生”。称陶公为陶征士或者陶靖节都是可以的,唯独称其为“陶靖节征士”是不可以的,正如上文所述,颜《诔》本来的题目为《靖节征士诔并序》,与正文“谥曰靖节征士”相吻合,但萧统《文选》更名为《陶征士诔并序》,这说明《文选》的编纂者也感觉到了“靖节征士”这一谥号的不顺^①。当然,这个谥号来自颜、陶二公的交游群体,未必出自颜公的本意,他只是如实记录而已。

无论如何,“谥曰靖节征士”是颜《诔》的一个硬伤;但是,历史已经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萧统《陶渊明传》^②与《南史·陶潜传》记载的“世号靖节先生”^③,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对陶公的称号,而“靖节征士”则很少被后人提及了。

二

颜《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云云,把陶渊明界定为晋征士,但后人又称陶公为“宋征士”,如钟嵘《诗品》卷中“宋征士陶潜诗”^④,《隋书·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梁五卷,录一卷。”^⑤与此类似的是,后人界定陶渊明所属的朝代也常常是或晋或宋,晋、宋并存^⑥。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首先来看陶渊明的第一次拒绝出仕。颜《诔》称:“有诏征为著作郎,称疾不到。”如上文所述,此事发生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义熙末年,刘裕已经晋升为宋王,执掌朝中大权。萧统《陶渊明传》载:

征著作郎,不就……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

因此,陶公拒绝朝廷的著作郎一职,本质上也是对刘裕的拒斥。而在刘裕登基之后,陶渊明就更不可能与刘宋政权合作了。颜《诔》称陶公“道必怀邦”,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刘裕主宰的刘宋政权是无道的政权,在登基之前,刘裕不仅大肆清除异己,并且仅仅为了迎合“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便杀害了安、恭二帝^⑦。陶渊明在晋朝时既然有拒绝征召之举,故可以称为“晋征士”。

第二次拒绝征辟发生在刘宋时代檀道济执政江州期间。萧统《陶渊明传》载:

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

① 法藏P. 3778 颜延年《阳给事诔并序》之后残存“《陶征士诔》一首颜延年”九字,见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6页。由此可知,“《陶征士诔》”这一题目属萧统《文选》原文。

② 萧统:《陶渊明传》,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1—193页。下引该传均据此本,不再一一出注。

③ 李延寿:《南史》卷75《陶潜传》,第1859页。

④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0页。

⑤ 魏征等:《隋书》卷35,第1072页。

⑥ 如“宋陶潜”的说法,见于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卷14,第363页;卷18,第446页。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21,第390页;卷23,第424页;卷27,第485页;卷35,第628页;卷36,第647页;卷38,第679页;卷55,第991页,第992页;卷65,第1158页,第1161页;卷72,第1248页。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卷761,第8799页;卷770,第8917页;卷816,第9502页;卷838,第9739页;卷855,第9956页;卷920,第10488页。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90王维《桃源行》解题引“宋陶潜《桃花源记》”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69页。

⑦ 《晋书》卷10《帝纪》:“帝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初谶云‘昌明之后有二帝’,刘裕将为禅代,故密使王韶之继帝而立恭帝,以应二帝云。”房玄龄等:《晋书》,第267页。刘裕连傻皇帝都不放过,足见其心性之残忍。

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所谓“州召主簿”,就是指江州刺史檀道济征召陶渊明为主簿。檀氏本为刘裕手下大将,其征召陶渊明为官,显然是秉承了宋武帝的旨意,故此次州里的征辟本质是朝廷的征辟。檀道济是粗人,尽管刺史可以自行征辟主簿,但如果没有朝廷授意,他是不会有征辟之举的。陶公不为所动,檀氏乃亲自登门拜访,加以劝说;但其所谓“文明之世”,实际正是“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这种粉饰之辞,陶渊明自然是不会苟同的。陶公的回答委婉而巧妙,并未直接针砭黑暗现实,却断然拒收檀道济的馈赠,这与颜公“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所反映的深厚友情和信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萧统《陶渊明传》称“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意为元嘉四年刘宋朝廷将对陶渊明将再有“征命”,这明显系接续檀道济征辟一事而来。

总之,在东晋末期和刘宋初期,陶渊明都曾拒绝征辟,所以无论称其为“晋征士”,还是称其为“宋征士”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陶渊明本人可能对此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三

钟嵘《诗品》卷中“宋征士陶潜诗”条,对“宋征士”,王叔岷指出:

古直云:“颜延之《[陶征士]诔》云:‘有晋征士陶渊明。’仲伟误也。”案孙志祖《读书胜录》三云:“渊明为彭泽令于义熙二年,即解印归里,高风亮节,但可为晋之隐逸,而不可为宋之隐逸也。《晋》《宋书》俱入《隐逸传》《宋书》有传,毋乃渊明之所羞乎!”颜延之《诔》谓陶公“为彭泽令,弃官从好,结志区外。”则其称“有晋征士陶渊明”,从陶公之志也。孙氏亦就陶公之志而言。如据颜《诔》谓“征著作郎,称疾不赴,元嘉四年卒于浔阳县柴桑里。”就陶公之卒而言,则仲伟称“宋征士”亦非误。《艺文类聚》三六引“宋陶潜《归去来辞》”云云,亦称“宋。”惟称“宋”有乖陶公之志耳。^①

颜《诔》说陶公“居无仆妾”,但《归去来兮辞》说“童仆欢迎”,萧统《陶渊明传》说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显然陶家是有仆役的。颜延之有意美化陶公,所以说“居无仆妾”。当然,这句话未必是写实,而是沿袭了描写高士的一种语言习惯,如李善注引范曄《后汉书》曰:“黄香家贫,内无仆妾。”^②但是,颜《诔》确实是强力塑造了陶渊明躬耕自资的隐者形象,这是“从陶公之志”的结果,如颜《诔》称陶公:

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絢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灌畦鬻蔬”的“鬻”字通“育”,为养育之义;“织絢纬萧”,絢是“网罟之别名”,“萧”是捕鱼用的帘子(现在南方人一般叫“围子”),“织絢”与“纬萧”匹配,“就是织网编帘,编织的都是渔具”^③。蔬菜和鱼类均可以作为祭祀用的供品,捕获的鱼也可以补充粮食的不足,所以这两句话是互文见义的。这两句话暗含着很多古典。“灌畦”一句,李善注引潘岳《闲居赋》曰:“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又引《公羊传》:“齐大夫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织絢”句,李善注引《穀梁传》曰:“宁喜出奔晋,织絢郟战,终身不言卫。”并引郑玄《仪礼注》曰:“絢,状如刀,衣履头也。”又引《庄子》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及司马彪注曰:“萧,蒿也。织蒿为薄。”但颜延之更多呼应的是“今典”,即诔主的诗文:

1.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答庞参军》)^④

①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第260—261页。

② 《后汉书》卷80《黄香传》:“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范曄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13—2614页。据《隋书·经籍志》,在范曄之前已有多家《后汉书》,如吴武陵太守谢承、晋少府卿华峤、晋祠部郎谢沈和晋秘书监袁山松等。

③ 参见钱仓水:《“纬萧”考说》,《光明日报》2020年6月6日第11版。

④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页。

2. 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戊申岁六月中遇火》)^①

3. 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②

4.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十二首其八)^③

颜《诔》“灌畦鬻蔬”四句并非对陶渊明生平事迹的凭空建构,而是与陶渊明诗文形成的深度互文。这种互文既体现为文本内容的直接呼应,也暗含精神内核的同构,是颜延之对陶渊明“躬耕自守”人生选择的精准提炼,亦是陶渊明自我书写的“他者印证”。首先是表层互文:劳作场景的文本呼应。颜延之笔下的“灌畦鬻蔬”,直指陶渊明诗文中反复出现的灌园躬耕意象,二者构成“他述”与“自述”的文本互证关系。陶渊明《答庞参军》云“朝为灌园,夕偃蓬庐”,以“朝”“夕”的时间维度,勾勒出“灌园劳作—蓬庐休憩”的日常节奏。颜延之的“灌畦”正是对“灌园”这一核心动作的同义改写,“畦”特指规整的菜圃,比“园”更具象性,精准还原了陶渊明躬耕劳作的具体形态。值得注意的是,陶诗“灌园”与“有琴有书”“载弹载咏”并置,凸显劳作之余的精神愉悦;颜延之则补充“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点明劳作的现实功用——以种植售卖蔬菜,换取祭祀所需的微薄物资。二者一写“劳作之乐”,一写“劳作之用”,共同拼合出陶渊明躬耕的完整图景。“灌园”在此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乱世中退守本心的精神寄托——当理想中的“东户时”(上古太平之世)不可得,便以躬耕坚守个体的生存尊严。颜延之“灌畦”的表述,正是对这种“以耕为守”的人生选择的凝练概括。如果说陶诗是从主体视角书写躬耕的精神价值,颜《诔》则是从旁观者视角确认这种人生选择的现实意义,二者形成互文。陶渊明《和刘柴桑》提出“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的生活理想,主张耕织所得满足基本需求即可,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杂诗》其八则直言“所业在田桑”,坦陈躬耕的处境——“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即便辛劳终年,仍难免饥寒,却始终坚守“代耕本非望”的初心。颜延之的“灌畦鬻蔬”“织絢纬萧”,恰好对应陶渊明诗中的“耕织”。“灌畦鬻蔬”是“耕”的具体化,“织絢纬萧”是“织”的延伸。而“为供鱼菽之祭”“以充粮粒之费”,则精准呼应陶渊明“耕织称其用”的底线需求——劳作所得仅为满足祭祀、口粮等基本生存需要,绝非追求物质富足,与陶渊明“过此奚所须”的价值观完全契合。其次是深层互文:精神内核的同构与共鸣。这种互文性超越了表层的“场景对应”,更指向精神内核的同构——对“不慕荣利、坚守本真”人格的共同书写。陶诗反复强调对官场的疏离,《杂诗》其八“代耕本非望”一句,直接否定了为官食禄的人生路径;而“所业在田桑”则明确了躬耕自守的人生选择。颜《诔》以“灌畦织絢”的劳作场景代替对陶渊明仕隐经历的直接叙述,实则是以“行为事实”印证陶渊明的“价值抉择”——当世人皆以仕途为进阶之途时,陶渊明却以耕织为生,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世俗价值的反叛。二者的互文关系在于:陶渊明以“自述”确立“隐”的主体性,颜延之以诔文将这种主体性升华为一种值得称颂的人格典范。陶诗中不讳言躬耕的艰辛——“寒馁常糟糠”“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却始终保持“且为陶一觞”的豁达;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颜《诔》中体现为对劳作价值的肯定:“灌畦鬻蔬”“织絢纬萧”并非卑微的谋生手段,而是陶渊明坚守“道”的载体。颜延之没有刻意美化陶渊明的生活处境,而是如实书写其劳作的功用(供祭祀、充口粮),这种客观表述,恰恰与陶渊明诗中“拙生失其方”的自嘲形成互文,共同塑造出一个“贫贱不能移”的隐士形象。从互文性理论视角看,陶渊明的诗文是“原文本”,是对自身人生选择的“自我书写”;颜《诔》是“衍生文本”,是对原文本的解读、提炼与再创造。颜延之通过对陶渊明诗文中“灌园”“耕织”等意象的筛选与整合,将其转化为诔文中凝练的“灌畦织絢”,使陶渊明的个体经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格典范。这种互文性也反向赋予陶渊明诗文更

①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3,第82页。

②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2,第58页。

③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4,第119页。

深的历史价值——颜延之作为与陶渊明同时代的文人,其解读为后世理解陶渊明提供了最直接的当代视角,成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的重要起点。简言之,颜《诔》与陶渊明诗文的互文,是文本呼应与精神共鸣的双重统一,既印证了陶渊明躬耕自守的人生选择,也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隐士典范地位。

四

“靖节征士”这一别扭的谥号,其形成并非仅由陶渊明自身的人格特质所决定,背后更存在特殊的历史动因:为掩去陶渊明曾入桓玄幕府的仕宦经历。这是颜延之一众友人为庇护陶渊明刻意安排之举,也是颜《诔》着力塑造陶渊明隐者形象的集中体现。

从政治史维度来看,史实往往会对亲历政局的个体造成最深的伤害。是以颜延之势必会为陶渊明周全考量,更要顾及陶氏子孙后世。倘若友谊为灵魂栖居之所,那么颜、陶二人便拥有相通的精神内核,喜乐忧患彼此共通;对于陶渊明一生全部仕宦履历,颜延之更是了然于心。关于陶渊明生平的仕宦情况,袁行霈指出:

陶渊明先后出仕共五次:第一次起为州祭酒;第二次入桓玄军幕;第三次为镇军参军;第四次为建威参军;第五次任彭泽县令……第五次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即赋《归去来兮辞》,永归田里。

求为彭泽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而这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①

关于陶渊明五次出仕及彭泽令任职性质的上述论断,是立足文本考据与精神分析的经典结论,既厘清了陶渊明仕宦生涯的客观脉络,又精准捕捉到其“仕”与“隐”的内在张力,为陶渊明人格与创作研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框架,具有三重核心价值:第一,史料梳理的严谨性:厘清仕宦轨迹的清晰脉络。袁行霈将陶渊明的仕宦经历明确划分为“五次出仕”,是对陶渊明生平考据的系统化整合。从现存史料与陶渊明诗文互证来看,“州祭酒—桓玄军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的序列,与《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等正史记载及陶渊明《饮酒》《归去来兮辞》等自述文本高度契合。尤其是将“入桓玄军幕”“任镇军、建威参军”等依附性僚佐经历独立分列,而非笼统归为“出仕”,更凸显出陶渊明仕宦生涯的阶段性与被动性——其出仕多为家境贫寒所迫(《归去来兮辞》序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且始终处于权力边缘,从未真正融入官场体系。这种清晰的阶段划分,打破了以往将陶渊明仕隐简化为“两次出仕、一次归隐”的模糊认知,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实基础。第二,精神解读的深刻性:洞见“仕”向“隐”过渡的节点与本质。论断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是提出“求为彭泽县令这件事本身就是退出仕途的准备”。这一观点跳出了“被迫归隐”的传统叙事,转而从陶渊明的主体性选择切入,揭示其仕宦生涯的终极指向是“隐”而非“仕”。具体表现为:其一,任职动机的非政治性:陶渊明求任彭泽令,并非为了施展政治抱负,而是看中“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兮辞》序)——一个能满足其基本生活与精神需求(饮酒)的闲职。这种动机本身就与官场的权力追逐格格不入,暗含“借仕养隐”的初衷。其二,任职状态的疏离性:袁行霈强调“八十余日他已脱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精准把握到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的精神姿态。彼时东晋政局动荡,桓玄之乱余波未平,刘裕与司马氏的权力博弈已见端倪,而陶渊明在彭泽的八十余日,既无政绩记载,亦无涉政诗文,恰是其主动与政治漩涡切割的体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并非一时冲动的反抗,而是长期“蓄谋归隐”的必然爆发。这一解读,将彭泽令的八十余日定位为陶渊明从“仕”到“隐”的过渡节点,而非孤立的“归隐事件”,深刻揭示了其“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的本性。袁行霈的论断,明确了“五次出仕”是陶渊明精神成长的历练过程,彭泽归隐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其历经仕途沉浮后,对自我人生价值的最终确认。这一视角,让后世研究者得以跳出“隐逸诗人”的标签化认知,深入理解陶渊明“真”与“朴”的人格底色——其归隐不是对现实的

^① 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逃避,而是对理想生活方式的主动建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五次为官的仕履生涯中,陶渊明先后三次在军队中担任参军,尤其是担任桓玄的参军,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整个南朝的历史,有四位皇帝从参军之职开始创业。参军是军队中掌握核心军事机密的人物之一,这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宋武帝刘裕早年就做过北府军事首脑刘牢之的参军^①。所以,陶渊明可以说自己因为贫穷而出仕,但却不能说自己因为贫穷而出任参军。而三任参军乃是陶渊明生平的三个重要节点。当然,东晋末年政局动荡,趋时取巧之辈比比皆是。这类汲汲于私利、图谋资本的投机者头脑清醒、精于算计,能够随各派势力的盛衰更迭虚与委蛇、应变趋时,或顺势进取,或敛迹退避,在政坛周旋游走、游刃有余,寒族文人傅亮便是其中典型代表。《宋书》卷43《傅亮传》:

傅亮字季友,北地灵州人也……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初为建威参军,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欲令整正秘阁,未及拜而玄败。义旗初,丹阳尹孟昶以为建威参军。^②

他成功地实现了由桓玄阵营向刘裕阵营的角色转换,最后成为刘裕的佐命功臣之一。但陶渊明的情况与他不同,就政治选择而言,陶渊明自始至终都属于桓党,而不是刘党。

袁行霈考定陶渊明入桓玄军幕一事的主要依据是陶渊明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以下简称“《夜行》”)诗:

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③

江陵是楚国旧地,也是荆州治所。从诗题看,这首诗作于晋安帝隆安五年(401),这一年是辛丑年,诗题的意思是:辛丑年七月回家乡浔阳度假,返回江陵时夜行经过途口。从诗题与创作时间来看,《夜行》作于陶渊明赴江陵桓玄幕府的夜行途中,此时的他正处于“从隐入仕”的短暂过渡阶段,诗中处处可见“闲居之乐”与“怀役之苦”的矛盾张力。起笔“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以回溯性的视角,勾勒出此前归隐生活的精神状态——三十年闲居已让诗人与世俗事务隔绝,诗书与林园成为精神寄托。“如何舍此去”的反问,直接袒露了诗人被迫离开田园、奔赴幕府的无奈。“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点明出行的时间(新秋之夜)与场景(渡口送别);“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皛皛川上平”四句,以清旷寂寥的夜景,烘托出诗人独行途中的孤寂心境。而“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一句,将“怀役”的奔波疲惫与“孤征”的精神孤独相融合,直白道出入幕为官的身不由己,暗示此次出仕的现实动因。这首诗以夜行途中的景物描摹为载体,通过密集的古典文本互文,构建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既坦陈了入幕桓玄的现实处境,又坚守了“养真守拙”的精神底线,是解读陶渊明仕隐抉择复杂性的关键文本。

“遥遥”句,唐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商歌”句,李善注引《淮南子》:“宁戚商歌车下,而桓公慨然而悟。”又,许慎《淮南子注》:“宁戚,卫人。闻齐桓公兴霸,无因自达,将车自往。商,秋声也。”^④这条注做得好,因为陶渊明正是以贤人宁戚自比,而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比桓玄,这是《夜行》诗的第一层互文。宁戚是春秋时期的寒门贤士,因未得明主赏识而沦为挽车之人,其“商歌”是怀才不遇的抒怀;陶渊明出身寒门,在东晋门阀制度下仕途不畅,入桓玄幕府或许暗含“遇明主、展

① 《宋书》卷1《武帝纪》:“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贼孙恩作乱于会稽,晋朝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高祖参府军事。”沈约:《宋书》,第1—2页。

② 沈约:《宋书》,第1335—1336页。

③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377,377页。

抱负”的微弱期许。《晋书·桓玄传》称桓温偏爱桓玄,“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南郡公”^①,所以依照晋人的惯例,桓玄也可称为桓公,正如桓温以封临贺郡公被人们称为桓公一样。《晋书·刘牢之传》载参军刘袭痛斥刘牢之反复无常,谓“今复欲反桓公”^②,这个“桓公”正是指桓玄。李善注又引《庄子》“卞随曰”云云以及《论语》“长沮、桀溺耦而耕”和《周易》“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乃至曹植《辩问》“君子隐居以养真也”等语。卞随的话见《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③李善注引《庄子·让王》中卞随拒绝参与商汤伐桀的典故,陶渊明以“商歌非吾事”呼应卞随的“非吾事也”,完成了第二层互文。这一表述是对前一层期许的限定与修正:诗人明确表示,自己入幕并非如宁戚一般追求功名,更不会像谋士一样为桓玄出谋划策——尤其是桓玄彼时已显露篡晋之心,卞随“不与伐桀”的选择,恰是陶渊明“不与篡逆”的精神宣言。这一互文,将诗人与桓玄的关系界定为“暂依幕府以谋生”,而非“依附权贵以谋政”,划清了个体立场与政治野心的界限。陶渊明巧妙地吸收古典文本,形成了一套深隐的政治话语。诗人意在表明自己仕于桓玄手下,既不是为了功名富贵,也不会为伐人之国而出谋划策,其真正的情志寄托仍在于归隐田园,养真于衡门茅茨之下,以求得永恒的善名。诗歌后半段“依依然在耦耕”“投冠旋旧墟”“养真衡茅下”,接连化用《论语》中长沮、桀溺“耦而耕”的典故与曹植“隐居以养真”的表述,完成了第三层互文,也成为全诗情志的落点:“耦耕”象征田园躬耕的理想生活,“依依”二字凸显诗人对归隐的眷恋;“投冠旋旧墟”则以未来的归隐抉择,回应开篇“如何舍此去”的无奈,形成首尾呼应的结构闭环。“不为好爵荣”“庶以善自名”直接点明初心——入仕绝非追求爵位荣华,最终的归宿仍是“衡茅下”的养真守拙,这与《和刘柴桑》“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的价值观一脉相承。

《夜行》诗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以互文性的写作策略,展现了陶渊明在仕隐夹缝中的真实精神状态,打破了“隐士陶渊明”的标签化认知:首先是消解“非仕即隐”的二元对立。诗歌既不美化入幕的选择,也不刻意标榜归隐的清高,而是如实书写了寒门士子“为生计而出仕”的现实无奈,以及“守初心而拒染政治”的精神坚守。这种“暂仕而终隐”的轨迹,更贴近东晋寒门士人的生存真相。其次是构建“以文自守”的精神防线。陶渊明通过对宁戚、卞随、长沮、桀溺等古典人物的互文引用,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了正当性与精神高度——在权臣幕府的政治漩涡中,他以古典文本为“精神铠甲”,既避免了直接的政治批判,又清晰地传递出“不与篡逆、坚守本真”的立场。这首诗创作于陶渊明入桓玄幕的关键节点,既是对前期归隐生活的回望,也是对后期彻底归隐的预告。诗中“怀役”的疲惫与“养真”的执念,为理解其后续创作(如《归去来兮辞》)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依据——彭泽辞官并非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精神坚守的必然结果。《夜行》是陶渊明仕宦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情志自白书,其通过精妙的古典互文,在现实与理想、仕与隐的矛盾中,构建了一套深隐而坚定的士人话语,深刻诠释了“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④的人格内核。

关于陶渊明出仕桓玄一事,袁行霈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指出:

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故于其诗义亦曲为之说,实不足据也。^⑤

其关于陶渊明隆安五年任职江陵即入桓玄幕府的论断,是以时间线与地理沿革为核心的考据典范,既厘清了陶渊明仕宦经历中争议性的关键节点,又打破了传统研究的“讳饰倾向”,为陶渊明生平与思想研究提供了客观严谨的史料支撑,树立了“史实优先、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范式。论断首先明确核心史实:江陵为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十二月袭杀殷仲堪,次年三月正式任荆州刺史,直至元兴三年败死,期

① 房玄龄等:《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85页。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84《刘牢之传》,第2191页。

③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18页。

④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5,第159页。

⑤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第291页。

间荆州刺史一职“未尝易人”。这一梳理精准划定了桓玄对荆州的绝对掌控期,为陶渊明的任职归属提供了“空间—权力”的背景框架。陶渊明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恰处于桓玄掌控荆州的时间范围内。在“一地一主官”的东晋地方行政体系中,陶渊明若在江陵出仕,其僚佐身份必然隶属于荆州刺史桓玄,这一推论符合东晋幕府制度的基本逻辑——地方刺史总揽辖区军政大权,僚佐皆为其幕属,不存在脱离刺史体系的独立任职可能。这种“时间吻合+行政体制匹配”的考据方法,摒弃了主观臆断,以硬性史实为依据,彻底夯实了“渊明入桓玄幕”的结论。袁行霈对陶澍等人讳言渊明“仕玄”的批判,直指传统陶渊明研究的价值预设偏见,具有重要的学术纠偏意义。桓玄在东晋历史上是典型的“篡逆者”形象——其篡晋建楚的行为,在正统史观中被视为“乱臣贼子”之举。陶澍等后世学者出于对陶渊明“高士”“隐士”人格典范的维护,不愿承认其曾入桓玄幕府的经历,担心这一履历会损害陶渊明“不慕荣利、坚守气节”的形象;为了“讳饰”这一经历,陶澍等人对陶渊明涉及江陵、桓玄时期的诗文进行刻意曲解,将其中可能暗含幕府生活的内容,强行解读为“隐逸之思”或“无关仕宦之咏”。这种解读方式背离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原则,本质是用价值判断取代史实考据,导致对陶渊明这一阶段生平与创作的研究陷入“主观化”误区。袁行霈的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研究的核心问题:史实考据不应为“圣人化”的人物形象服务,承认陶渊明入桓玄幕,并非否定其人格,而是还原其仕宦生涯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这一论断的深层价值,在于为理解陶渊明的仕隐转变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跳出了“非仕即隐”的二元化认知。

东晋时期,寒门士子入幕为官是常态的仕进路径。桓玄在掌控荆州初期,曾以“改革时政”为旗号,吸引了一批渴望改变现状的士人。陶渊明出身寒门,彼时尚未确立归隐之志,入桓玄幕可能是其“欲展抱负”的一次尝试,这一选择符合当时寒门士子的生存与发展逻辑。承认陶渊明入桓玄幕的经历,更能凸显其后续归隐抉择的主动性与思想深度。陶渊明在桓玄幕中,目睹桓玄从“改革者”转向“篡逆者”的过程,这一经历让他彻底认清东晋官场的腐朽与权力斗争的残酷,成为其最终告别仕途、坚守田园的重要契机。若刻意回避这一经历,反而无法完整解释陶渊明“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思想成因。袁行霈的考据,让陶渊明的形象从“完美隐士”回归为有挣扎、有抉择的真实士人,其仕宦经历的复杂性,恰恰印证了其归隐选择的可贵性。

陶渊明此番仕宦经历,实为浔阳陶氏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之间深厚的世交渊源所决定。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又为安西将军庾翼府功曹,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①

可知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曾经担任桓温的参军,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而孟嘉与桓玄的岳父刘耽的关系非常密切,同在桓温幕中共事(刘耽也是桓温的参军)^②,而陶渊明那位在朝中担任太常的族叔陶夔与孟嘉、刘耽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陶渊明对这一切均直言不讳。事实就是如此,任何形式的遮掩都是徒劳的^③。

如上文所言,桓玄曾一度篡夺了晋朝的江山社稷,陶渊明曾出仕于桓玄幕府,然而,不久之后桓玄就被刘裕消灭了,晋室江山得以恢复;在这一背景下,陶渊明的处境可谓岌岌可危;而在刘裕称帝以后,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直接关乎陶渊明及其家族的命运。作为陶公的挚友,颜延之对他的这段经历非常了

①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6,第170—171页。

② 《晋书·刘耽传》:“耽字敬道。少有行检,以义尚流称,为宗族所推。博学,明习《诗》《礼》、三史。历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在职公平廉慎,所莅著绩。桓玄,耽女壻(婿)也。及玄辅政,以耽为尚书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寻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耽子柳。”房玄龄等:《晋书》卷61,第1676页。

③ 清人陶澍认为陶渊明既非刘裕的参军,亦非桓玄的参军,《夜行》诗所谓“始作镇军参军”,此一镇军将军究竟是何人,已不可考。见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卷3,《四部备要》第6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4页。实际上,陶澍是在有意遮蔽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刘裕,还是桓玄,都属于乱臣之列。

解,所以“靖节征士”这一不伦不类的谥号就是有意遮蔽陶渊明与桓玄的关系,我们对此应该持“了解之同情”^①的学术态度。颜《诔》称:“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将陶渊明确定性为“有晋征士”和庐山隐者,也是有意淡化陶公当年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这当然也是最符合陶渊明辞官归隐后的心志和愿望的。“在我中晋,业融长沙。”^②陶公《命子》诗回顾祖先功业时的骄傲以及作为晋人的自豪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情感与其服务于桓玄这位乱臣贼子的经历却有着极为强烈的冲突。无论如何,在刘裕篡夺晋室的江山社稷之后,陶渊明已经成为一朵无依的孤云,在刘宋王朝那充满血色的天空里飘荡。宋吴仁杰《陶渊明年谱》称:“延之作先生诔云‘有晋聘士陶渊明’,既以先生为晋臣,则用其旧名宜矣。延之与先生厚善,著其为晋聘士,又书其在晋之名,岂亦因是欲见先生之意耶?”^③此言颇为中肯。《宋书·周续之传》载:“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④自颜延之至沈约,陶渊明始终被归入隐士之列,其“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⑤的政治履历亦随之被淡化。与之相伴的是,陶诗的文学光彩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当世公认的隐士身份所遮蔽。这正是“靖节征士”谥号背后的深层背景。

总之,“靖节征士”这一谥号存在的问题一向被学术界所忽略。实际上,“靖节征士”这一谥号,是晋宋之际部分士林精英刻意将陶渊明隐士化的产物。该谥号与陶渊明早年仕履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以颜延之为核心的陶渊明交游群体,意在调和二者冲突。与此同时,陶诗塑造的自我形象,与现实中的陶渊明本人存在差异,且陶渊明本人的思想与行迹也处于动态演变之中。但是,更为重要且必须着重强调的是: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履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⑥,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履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陶渊明的“田园”从来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承载其政治理想的精神乌托邦。他在《桃花源记》中构建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理想社会,本质上是对东晋门阀政治的批判与反动;他笔下“躬耕自资”的生活姿态,也是对当时士族阶层空谈玄理、不恤民生的反抗。这种政治情怀并非追逐功名的野心,而是对清明世道、民生安乐的关切。正是这份未泯的情怀,让他的归田之梦具有了超越个人避世的人文厚度,也让他的田园诗摆脱了隐逸文学的狭隘性——政治履历赋予他以批判眼光与价值坚守,政治素养赋予他以书写深度与精神高度。陶渊明不仅是一位隐者、一位诗人,还是一个军人、一个官员,陶诗中不仅有芬芳的菊花和挺拔的青松,还有寒光闪闪的兵器;不仅有归隐田园的情志,还有运筹帷幄的机心。隐者、诗人、军人、官员以及先后两个女人的丈夫和五个男孩的父亲,这就是陶渊明。陶渊明有爱,也有恨;有超越,也有世俗;有欢乐,也有悲伤。没有可怕的深度,就没有真正美丽的水面;没有恐怖的经历,就没有真正平和的生活。所以,论陶者和研陶者的首

① 陈寅恪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9页。

②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1,第28页。

③ 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页。

④ 沈约:《宋书》卷93《隐逸列传》,第2280页。

⑤ 《宋书·陶潜传》还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沈约:《宋书》卷93,第2288—2289页。陈培基认为,所谓“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这是史臣隐晦地交代了陶潜当过桓玄官吏的史实”,而“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是史臣明确告诉人们,陶潜的不复肯仕,是与刘裕有关”。陈培基:《陶潜归隐真相新解——从陶潜与桓玄的关系说起》,《福建论坛》1986年第1期。

⑥ 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第260页。

要之务是通观其全人^①。

陶渊明的田园诗看似远离政治，实则处处渗透着政治的影子，这种“以隐写政”的书写策略，恰恰是其政治素养的体现。真正的隐逸文学，往往是政治理想受挫后的精神突围，而非与政治的彻底割裂。“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归隐后的陶渊明已经与自然合一了。于是，在欣欣向荣的春天泥垄间，在归鸟趋林的夏日暮色里，在芳菊开林的重阳佳节时，在倾耳无声的大雪纷飞中，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篇篇浸染着田园风味和哲理色彩的文学经典，而后世无数的骚人墨客前赴后继地甘愿充当他的文学侍从。

“Master Jingjie the Recluse”: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Tao Yuanming in Yan Yanzhi's *Eulogy for Recluse Tao and Related Issues*

Luo Busang

Abstract: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Yuanjia 元嘉 reign (427), after Tao Yuanming's 陶渊明 death, Yan Yanzhi 颜延之 wrote "Epitaph for the Retired Scholar Jingjie", in which he conferred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Jingjie Zhengshi" 靖节征士 on Tao Yuanming. This paper, by taking this long-neglected posthumous title as its core subject of inquiry, combines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textu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its formulation basis, stylistic problems,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and the hidden background behind i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two characters "Jingjie" strictly follow the norms of "Treatise on Posthumous Titles" 谥法解 in *Yi Zhoushu* 逸周书, which accurately refines the spiritual core of Tao's personality, namely his gentle joyfulness through his final days, his love for integrity, and his self-restraint, and elevates the hermit cultur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from "indulgent seclusion" to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being content with poverty and adhering to morality". However, the inclusion of "Zhengshi" 征士 in the posthumous title is rigid and far-fetched in stylistic terms, which is a case of redundant wordi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Wen Xuan* 文选 also revised the title of the epitaph, which confirms the inappropriateness of this posthumous title. Both the titles of "Jin Zhengshi" and "Song Zhengshi" for Tao Yuanming are in line with historical facts, originating from his three refusals of imperial recruitment in the late Eastern Jin and Liu Song dynasties, and the title of "Jin Zhengshi" is more in line with his subjective aspiration of regarding himself as a Jin person. Yan Yanzhi's elegy and Tao Yuanming's poems and essays share a profound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and the shaping of Tao's image of farming by himself is the result of "following Tao's aspiration".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humous title of "Jingjie Zhengshi" is that Yan Yanzhi and other friends intentionally concealed Tao Yuanming's experience of serving in Huan Xuan's 桓玄 shogunate to protect Tao Yuanming and his family under the special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Tao Yuanming's literary achievements are inseparable from his political experience. His "pastoral garden" is not a pure geographical space, but a spiritual utopia carrying his political ideals. His pastoral poems seemingly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but in fact permeate the shadow of politics everywhere. The strategy of "writing politics through seclus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his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To study Tao Yuanming, we must view his whole life comprehensively,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his posthumous title and the unique value of his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Yan Yanzhi; Tao Yuanming; *Epitaph for the Retired Scholar Tao*; Jingjie Zhengshi; posthumous title; the Jin and Song dynasties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全广秀】

① 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38—539页。